



追求创新的天津克明料器厂

天津玻璃制造业起端于19世纪末,当时山东和广东商人合资设立玻璃厂,但规模较小,不久就歇业了。1902年茂泰玻璃厂创设,1908年永信玻璃厂成立,这两家工厂均由日资组建,雇佣日本技师,有玻璃制造经验的日本工人和中国学徒。此后,华资经营的玻璃工厂逐渐兴盛,到1923年,天津华商玻璃厂已有12家。20世纪二三十年代,天津玻璃工业已非常有名,成为全国仅次于山东博山的玻璃制造中心。天津克明料器厂是近代天津最著名的玻璃器皿制造厂,曾辉煌一时。该厂不断创新生产工艺技术,采用先进生产设备,产品独具特色、品类齐全,在天津同行业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。

1928年6月,天津克明料器厂成立,是合资建厂,位于天津市北营门外。设立之初,克明料器厂规模较小,占地面积小,资本总额3000元,主要生产雪花膏瓶子、灯罩之类的简单玻璃制品。不久,开始生产除玻璃仪器之外的所有玻璃制品,从酒具烟碟、各类灯罩及化妆品瓶,到“同心牌”暖水瓶、植物油灯等。产品除供销天津外,还远销北平、河北以及北疆草原。据1934年成书的《国货年刊》记载,当时克明料器厂制造的玻璃盆行销天津市,电灯罩远销河北、山西两省,牛奶瓶远销察哈尔省和绥远省,化妆瓶远销热河、山东两省,文具瓶远销陕西省,医药瓶和灯类畅销天津及河北各县。

20世纪三四十年代,郭润庭担任天津克明料器厂总经理,并逐渐成为该厂最大的股东。1940年克明料器厂已发展成为天津规模最大的玻璃器皿制造厂,资本达50000元。1941年3月,克明料器厂更名为天津克明诚记料器厂,为郭润庭所控股。由于他灵活敏锐的经营意识和集贤纳才的用人方式,使得克明诚记料器厂日益兴旺昌盛。据天津档案馆档案记载,1942年克明料器厂生产瓶子250000打,轧力玻璃杯11480打,磨花玻璃杯1540打,电灯罩1300打,油灯14400打,料碟270打,贡碟2700打。从业者150人,其中普通机工和徒弟100人。在工厂规模方面,机械房有5个,拥有轧力机、吹瓶机、磨活机、烧口机等机器设备,并设立3个分厂制造厂。其中制造厂是16间铝顶革棚,机器房是3间砖瓦房,材料库是8间铝顶革棚,制品库是8间铝顶棚,账房是4间砖灰房,宿舍是12间砖灰房,模具房是6间砖灰房,模具修造房是2间砖灰房。分厂制造厂有48间铝顶革棚,材料制品库有12间砖灰房,宿舍有10间砖灰房,账房有3间砖灰房,模具房1间,厂房面积已达1561平方米。

1933年8月,《大公报》记者曾对平津玻璃工业作过调查,调查显示:当时天津共有玻璃厂(俗称料器厂)10余家,主要分布于北营门及南市一带,但玻璃厂的出品及设备大多雷同。为在市场竞争中取得领先优势,

郭润庭坚持不断创新,追求独特的发展理念,始终在创新上狠下功夫,使产品处处别具匠心。

连最普通的化妆品包装瓶,郭润庭也费了一番心思。他认为,化妆品特别是高级化妆品属于一种奢侈消费品,化妆品瓶必须有所“讲究”,不仅要有使用价值,而且要有观赏价值,造型要美观,色调要漂亮。在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下,克明料器厂生产出了油玉、白瓷、葱心绿、黄、粉等多种颜色的雪花膏瓶。当时玻璃着色是一项关键技术,别的料器厂是难以做到的,很快克明厂就凭借五颜六色的雪花膏瓶垄断了天津市场。又如,克明料器厂专门研制、生产的小口径花露水、头油瓶,有的小到甚至装瓶时需要用针管注射,小口径瓶克服了市场上大口径瓶容易浪费、不好控制产品使用量的缺点,一经投放市场就受到了用户的欢迎,收到大批量订购单。再如,克明厂生产的玻璃酒杯也与众不同,总是在口杯上加工磨花后,才出厂销售。当时市面上磨花口杯稀少,克明厂的产品再次受到顾客的喜爱,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。克明料器厂不断创新研发,生产新产品,始终以独具特色的产品屹立于天津玻璃器皿市场,也让同行厂家难以望其项背。

如果没有技术人才,不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,产品的创新与特色便无从谈起,克明料器厂也就难以立足和发展。郭润庭为了吸纳高级人才,获

得先进技术,颇费心思。岳砚田是精于玻璃熔窑和配料技术的高级技师,郭润庭为了让他安心为厂服务,不仅拉他人股,给予高薪,还送他公司股份,委以重任。由岳砚田全权负责工厂技术监督与指导,凡事都跟他商量,唯恐有招待不周之处。不仅对岳砚田如此,凡是能干的和有手艺的员工,郭润庭都以礼相待。

郭润庭非常重视和爱惜人才,只要得知哪个工厂有适合自己工厂需要的技术人才,总会想方设法将其挖来或聘请加盟自己的工厂。例如,为了制造出与众不同的小口瓶,郭润庭千方百计地通过熟人,用高薪把一位编号为“机器刘”(刘玉堂)的技师从上海聘请至天津。刘玉堂加入克明厂后,解决了许多瓶子生产工艺上的技术难题,改进了瓶子质量,生产出独具特色的小口径瓶。郭润庭还特别关心技术人才的思想波动,用心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,想尽一切办法留住人才。有一次,东北某厂打算高薪挖走克明厂的一位青年人才,郭润庭闻讯后当即找到这位员工,一面积极劝说挽留,答应给他提高薪资待遇;一面四处张罗给他找对象,出资帮他完婚,给予多方面的生活关照。这位青年员工深受感动,终于留了下来。一时间在社会上被传为美谈。克明厂在追求“创新”与“特色”道路上不断进步,从中也可以管窥郭润庭对技术人才的重视和珍惜人才的良苦用心。

王丽

馆藏珍品——

青釉暗龙纹洗

宋官窑青釉暗龙纹洗高5.6厘米,口径19.5厘米,足径12.3厘米。洗壁垂直微向外撇,平底,圈足宽而浅。通体灰青色釉,青翠如玉,釉汁肥厚凝重,釉面布满了自然天成、纵横交错的开片。洗口部镶横口,圈足露胎呈褐色,紫口铁足的特征十分明显。洗内底印有一条苍龙,其形象矫健勇猛,笔触细微,但由于釉汁太厚,只有高光下才能显现,更增添了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的神秘之感。此洗釉色纯正,造型古朴、大方,为官窑典型器物,并且印有龙纹,较为罕见。《中国陶瓷发展史》一书记载过这种官窑洗,故宫博物院也收藏了这样一件洗子,深受清代皇室喜爱,器底刻有乾隆御题诗,可见其珍贵。



青釉盘



汝窑为五大名窑之首,窑址在河南省宝丰清凉寺,据考证烧造时间为宋哲宗元祐元年(1086年)到宋徽宗崇宁五年(1106年)二十年间,因烧造时间短,数量少,在南宋时就有“近尤难得”之说。汝窑瓷器如此珍贵,在博物馆界和收藏界无不以收藏汝瓷为至高荣誉。汝瓷现今传世不足百件,故十分珍贵。宋汝窑青釉盘高2.8厘米,口径17.2厘米,底径9.2厘米。口外撇,曲壁,圈足外卷裹釉。通体天青色釉,釉汁肥厚莹润,釉面上布满了细碎的冰裂纹,如冰似玉,清雅高洁。

汝窑为五大名窑之首,窑址在河南省宝丰清凉寺,据考证烧造时间为宋哲宗元祐元年(1086年)到宋徽宗崇宁五年(1106年)二十年间,因烧造时间短,数量少,在南宋时就有“近尤难得”之说。汝窑瓷器如此珍贵,在博物馆界和收藏界无不以收藏汝瓷为至高荣誉。汝瓷现今传世不足百件,故十分珍贵。宋汝窑青釉盘高2.8厘米,口径17.2厘米,底径9.2厘米。口外撇,曲壁,圈足外卷裹釉。通体天青色釉,釉汁肥厚莹润,釉面上布满了细碎的冰裂纹,如冰似玉,清雅高洁。

青花枇杷绶带鸟图盘

明永乐青花枇杷绶带鸟图盘,高9.7厘米,口径50.5厘米,底径34.8厘米。菱花口,板沿,细白砂底,有火石红斑。通体施白釉,满绘青花纹饰。口沿内绘一周青花缠枝莲纹,外口沿为一周汹涌澎湃的青花海水纹。内壁十六个花瓣内绘形状不同的青花折枝花果,外壁十六个花瓣内绘青花折枝菊花,内壁双弦纹内主纹纹饰为青花绘枇杷绶带鸟图。整个画面布局疏朗明快,运笔顿挫有致,极富节奏感,纹样显然出自同时期宫廷画院画师的稿本。此盘胎质细腻洁白,釉层肥厚晶莹,外底无釉,抚之有糯米粉般的爽滑感,青花色泽浓艳,蓝中泛黑,是用进口的“苏麻离青”料所绘。这种钴料在明朝时十分名贵。因为其含铁量高,含锰量低,所以,烧造后自然形成沉入胎骨的铁锈斑。



斗彩农耕图双耳扁壶

清乾隆斗彩农耕图双耳扁壶,高57.1厘米,口径10.6厘米,长足径21.5厘米。颈部有两个透雕龙形耳,腹部两面开光内斗彩绘江南农耕小景,分别为耕地和耙耨两个画面。壶侧用斗彩绘勾连纹,间绘蝙蝠、莲花、如意、万寿、编磬,寓“家园长兴”、“福增寿长”、“吉庆如意”之意。足内青花楷书“大清乾隆年制”六字三行方款。此器造型精美,色彩艳丽,图案新颖,是乾隆官窑中的绝妙之作。



《耕织图诗》是南宋绍兴年间画家楼涛所作,作品得到了历代帝王的推崇和嘉许。清朝康熙南巡,见到《耕织图诗》后,感慨于织女之寒、农夫之苦,传命内廷供奉集乘贞在楼涛基础上,重新绘制,计有耕图和织图各23幅,并每幅制诗一章。焦绘《耕织图诗》令康熙皇帝龙颜大悦,在序首钤盖了“佩文斋”朱印,在序后钤盖了“康熙宸翰”阳文朱方大印和阴文“稽古右文之章”朱方大印,再命著名木刻家朱圭、梅裕凤镌版印制,颁赐臣工。

白釉龙柄联腹传瓶

隋白釉双龙柄连腹传瓶,瓶高18.5厘米,口径5.2厘米,底径2.5厘米,腹径11厘米。盘口,单颈,双腹相连,连接处有两个环形系。肩左右两侧各塑一条修长的龙形柄,龙头探入瓶口内,似在贪婪地吮吸着瓶中的玉液琼浆。双龙柄由手工捏塑而成,手法简单干练,形象却生动逼真。双平底刻有铭文:“此传瓶,有並。”由此得知,这个瓶子的名称应为传瓶。“有並”又作何解呢?可以理解为此瓶瓶身双腹相连,也可理解为此瓶成双。这件传瓶,造型新颖别致,兼具北朝和隋代瓷器所特有的浑厚凝重,又不乏灵动活泼,其线条刚柔相济,是隋代创新的器型,代表了当时白瓷制作的最高工艺水平,成为隋代稀有的瓷酒器精品。



成语小故事——

千万买邻

梁武帝很欣赏吕僧珍的才干。有一次,吕僧珍请求梁武帝让他回乡扫墓。梁武帝不但同意,而且任命他为南袁州。让他光耀一下门庭。

吕僧珍到任后,不徇私情,秉公办事。因公会客时,连他的兄弟也只能在外堂,不准进入客厅。一些近亲,以为有了吕僧珍这样的靠山,可以不再做买卖,到州里来见他,以谋取一官半职。吕僧珍耐公说服他们回去,继续做自己的小生意。

吕僧珍住宅的前面,有一所他属下的官舍,平时出入的人很多。有人建议他要那个属下到别处去办公,把官舍留下来住。吕僧珍严词拒绝,表示决不能把官舍作为私人的住宅。

吕僧珍这种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,受到了人们的称颂。有位名叫宋季雅的官员告老还乡到南袁州后,特地居住吕僧珍私宅邻家的一幢房屋下来居住。一天,吕僧珍问他买这幢房子花了多少钱,宋季雅回答说:“共花了一千一百万。”

吕僧珍听了大吃一惊,反问道:“要一千一百万,怎么会这么贵?”宋季雅笑着回答说:“其中一百万是买房屋,一千万是买邻居。”

吕僧珍听后想了一会儿才明白,跟着笑了起来。

纲举目张

吕不韦(曾在邯郸经商)曾为秦朝的相国。他很注意研究治理国家的理论。他在“用民”一文中说道:“大凡使用人民,其上策是用义服人,其次是以赏罚治人。”

他接着写道:如果“义”不足以让人民为国家效力而死,“赏罚”不足以让人民弃恶从善,那就不能真正使用自己的人民。

吕不韦说,在禹的时代,天下有成千上万的诸侯国,到商汤时至少也有三千,这些诸侯国所以没有存在下去,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处理人民的关系。

吕不韦又说,人民不听君主的话,不受国家的使用,是因为赏罚不严。如果说商汤和武王能够有效地治理国家,那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使用人民的方法。

吕不韦总结说,人民所以听凭国家的使用,是有原因的,这就是:“用民有纪有纲,壹引起纪,万民皆起;壹引起纲,万目皆张。”这里说的纪和纲,也就是调动人民积极性,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。

“纲举目张”这个成语,便由吕不韦的这一论点演化而来。纲,指网上的大绳;目,即网眼。意思是说,提起网绳网眼就会全部张开。人们常用此典故比喻做事情要抓住它的关键。

天津地名考——

天津老四开

天津有一种“方位词”加“开”字的地名,如“南开”“北开”等,这在国内城镇地名中是极为少见的。

“南开”这个地名,最初是指旧城西门外以南的开洼荒地,就是今天南马路和南门外大街相交的西南一带地区。明朝时,这一带一片水泊,芦苇丛生,明代天津八景之一的“南原樵景”就指此地。明永乐初年在此驻扎军队,屯田垦种。清康熙年间,开辟洼地为稻田。

“定南禾风”就是真实的描写。清代1901年城垣拆除后,居民逐渐南移,此地才逐渐开拓为城区,民众仍习称“南开”,其地名依据就指旧城以南的开洼地。

1903年,比利时商人在广仁堂南营建电车公司。1907年天津第一私立中学堂迁到电车公司之南,遂改名为“南开学堂”。学校以地为名,“南开”这个地名也因南开大学、南开中学的声誉而名扬五洲。

在天津人的话语中,“南开”这个地名的语义所指,须依据上下文的语境进行判定,如“南开、红桥”,这里的“南开”指区名;“南开、天大”,这里的“南开”指南开大学;“耀华、南开”,这里的“南开”指南开中学;“娘家在城里,婆家在南开”,这里的“南开”指区片名。南开作为和小白楼、小树林、丁字沽等同类的小区片名,其地域范围大致北起南马路,南抵原墙子街,东至南门外大街,西至南开三马路、广开大街一带。所辖区域包括南河西、西门南、蓄水池、炮台庄四个街道办事处。

“北开”最初是指天津城北门以北的开阔地带,今指红桥区东部河北大街与北营门东马路交会处东南一带,东临北运河。清光绪年间,周盛传因镇压捻军有功,受赐在此建造祠堂,即周公祠。此后逐渐形成卖艺场地和旧货市场,黑白铁作坊也集中于此。

“老西开”原指位于天主教堂(今滨江道国际商场附近)以西一带的开阔地,后泛指南京路与营口道交口以西一带。

津门旧事——

坤班奎德社与时装新戏

从民国初年到卢沟桥事变这20多年间,在天津的戏曲舞台上,活跃着一个不论何种行当的角色,全部由女性扮演的坤班,它就是以演时装新戏著称的京津奎德社。

奎德社初名志德社,创建于1914年,1917年更名为奎德社。社址虽然设在北京,主要活动大都在天津,该社的公章上也标明京津奎德社。该社从始创到解体,始终由梆子演员出身的杨韵谱领导。他善于发现人才、培养人才、团结人才,许多有成就的梆子和京剧女演员,如鲜灵芝、张小仙、雪艳琴、刘香玉、秦凤云、李桂云、小兰芬、张蕴馨等人,在不同阶段分别担任该社主演,鼎盛时期,成员多达140名。杨韵谱接受辛亥革命志士王钟声的思想影响,在艺术实践中积极推行改良戏曲、针砭时弊、移风易俗的主张。奎德社在他领导下,20多年间先后排演了120多部时装新戏。这些剧目,有的取材于古今小说、电影故事、时事新闻,如《空谷兰》《渔光曲》《梁武帝》;有的是根据外国作品及传统剧目改编,如《茶花女》《不如归》《少奶奶的扇子》等等。这些新剧,涉猎的题材广泛,思想倾向比较复杂。但是,总体上体现出黑

暗现实的不满,有着淳朴的民主要求和爱国思想。奎德社在1931年“九·一八事变”后所演《战地之花》,控诉国民党当局违反民意,丧权辱国;“七·七事变”前夕所演《啼笑因缘》,热情歌颂东北义勇军。当时有人在报上著文,称赞奎德社艺人们“置身家于不顾,舍身取义,大节凛然。”

奎德社排演时装新戏,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,并且与南开学校新剧团建立了友好往来,杨韵谱曾两次观看新剧团的演出,还将该团所演《恩怨缘》《仇大娘》改编成时装新戏,由奎德社公演。周恩来、仇乃如、李福景等南开学校新剧团团员,也曾几次观看奎德社根据《仇大娘》改编、演出的《因祸得福》。1917年4月6日晚,南开学校校董董范孙、校长张伯苓等人,也亲往戏园观看奎德社演出的时装新戏《一元钱》,对奎德社改良戏曲、移风易俗的方向,给予了充分肯定。

奎德社虽然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烽烟中解体,但它20多年间在京津剧坛所取得的成绩,已被写进了天津的剧史。